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99 期

2020 年 3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影响西藏“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

——兼谈国民政府对事件的处置

喜饶尼玛 冯 翔

近代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与认知研究

徐百永

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

王海兵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影响西藏“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¹

——兼谈国民政府对事件的处置

喜饶尼玛、冯翔²

摘要：1947年发生的西藏“热振事件”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学界研究成果丰富，多认为热振呼图克图是一个倾向中央政府的爱国人士。但他被西藏地方政府拘押致死，中央政府何以处置手段软弱，则多语焉不详。主要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西顾，噶厦遂在英国人挑唆下，任意非为，使爱国内向力量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根据新的档案史料，细考历史，则发现其中另有蹊跷，值得深思。

关键词：民国西藏；热振事件；治藏策略

谈至1946年就已初露端倪，1947年最终发生的西藏“热振事件”，学界多认为在国民政府方面，主要是由于内战全面爆发，在宣布全面“戡乱”和国民党军队逐渐由进攻转为防守的时候，中央政府着实无力营藏。[1]而这也恰好为西藏地方政府洞悉，成为其敢于发动“热振事件”，并不遵中央电令的一个原因。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不仅不予问责，反而承认既成事实，有主动妥协之感，又无形助长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独立”气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地位也因中央的处置方针再次下降，其处境更加尴尬。因此，国民政府多年来对藏事努力的成果多付之东流，中央威信严重受损。

一、无兵可用？

此时，国民政府真的是无暇西顾，无力、无奈吗？有史料称蒋介石曾说“此时对藏似不宜用兵”^[2]。应该注意的是，这条指令发出的时间为1946年5月5日，并非解放战争的反攻阶段，此时的“不宜用兵”并非不能用兵，更非无力、无奈，而是有其他考量。

历史并非如此简单。1946年11月15日，国大正式召开，蒋介石认为“国民大会开幕，此次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3]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还谈到“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之结果。”^[4]应该说，他此时的处境要比1942年“外交局事件”时好得多吧。须知，当时他对西藏驻京人员的斥责，调动青康军队的决心，乃至飞机轰炸的威胁，可是在日寇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做出的。

需要再说明的是，1947年5月，正处于解放战争战略防御期，国民党军队在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中尚处于优势地位，同年3月，蒋介石心腹胡宗南攻占延安城，手握40万国民党军队横行陕甘宁青。此时蒋介石为掌控新疆局势，陆陆续续地往新疆派驻10万军队。^[5]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军事力量的上升期和政治权威的高峰期。因此，蒋介石若有心，是完全有能力快速运兵到西藏助热振活佛复位的。

其实，热振事件发生后，最终在厘清西藏局势时，保密局奉蒋介石之命，已有预备方案，准备武力干预。^[6]而且，文官长吴鼎昌认为可以“密令马步芳或刘文辉派兵二三千作进驻昌都态势”，

¹ 本文刊载于《中国藏学》2019年第2期。

² 作者：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冯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毕竟藏军兵力仅有 6000 人，无作战能力，“如无外援，必可不战而屈”。^[7]这种情况，何以放弃？

细思极恐，过去史料的欠缺，竟然导致了对这段历史的误判。

二、南京的争论

1946 年 4 月 20 日，驻拉萨的军统负责人魏龙密报，“西藏内部矛盾百出，摩擦日烈”，由此得出他的结论：这是一举解决西藏问题的好时机。^[8]据报，魏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侯国柱与热振活佛来往密切，在两人的交谈中，热振表示“本人之潜伏势力相当雄厚”“如中央军队能入藏则所需军粮及派遣向导均由本人负责”“成功之后本人当即通电拥护中央，对外交之态度则由中央决定……西藏之建设则以不违背西藏宗教为原则并请中央派员指导”。^[9]可以说热振的表态非常符合国民政府对边疆治理的期待，这些秘密谈话也一定给魏龙以极大的信心，由此认为应该帮助热振复位，避免西藏地方政府落入他人之手。^[10]

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另有他见，认为“热振下台已久，势力渐衰”^[11]；提出中央政府打交道的对象应该首先是西藏地方出席“国大”的代表，认为他们才真正“负有商谈藏事任务”，并且“在现阶段下应以藏政府之实力派为对象”^[12]。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持有类似意见。1946 年 5 月 30 日，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徐认为热振派实力难堪大任，更重要的是“查自我抗战胜利后，西藏政府态度转变甚大。举凡拒绝英人价售存印军火，拒绝英人领土要求及派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均足证明对中央倾向之意”^[13]，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宝押在一人身上。他提到“查热振系前任摄政，自卸职后时谋复位而未果。——中央如欲援助在野之热振以推翻现在西藏政权，诚恐热振力量薄弱，事机不密，易为西藏政府发觉，则不但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反而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惧，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14]

徐永昌也认为最佳策略是先与西藏地方出席“国大”的代表商讨相关事宜，但不拒绝对热振的支持，“对于热振方面亦应善予抚慰，并暗中援助……热振应先尽量暗中寻求党羽，秘密扩张势力，但不能轻举妄动”。^[15]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遵照中央决议，则“应飭热振派遣亲信可靠之代表前来，共同策划秘密供给军火之运输路线”。^[16]

令人颇感好奇的是，国民政府要员罗良鉴和徐永昌为何持有如此相近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有关^[17]。1946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亲自向外交部打招呼，对沈宗濂 2 月 8 日要求伴同西藏地方出席“国大”的代表团内返一事做出指示：“此事甚关重要，即希迅与酌办为要”。^[18]4 月 7 日，沈宗濂陪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国大”代表团抵达还都不久的南京，这意味着作为蒋介石亲信的沈宗濂，可以在南京全程、近距离地介入此事的讨论，并施加他的影响。7 月 9 日，沈宗濂向蒋介石呈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而报告的批注上显示了蒋介石“赐阅全文”^[19]，可见在藏事方面沈宗濂对蒋介石的影响。

作为处理藏事的一线高级官员，沈宗濂在此长篇报告还写道：“藏政府内热振之旧部业已撤换殆尽，兹进一步征收热振所藏之枪械，热振感觉不安，情急求援，自在意中。前弟在藏时，曾与热振密切联络，惟细察其为人贪而无谋，左右亲信亦乏才能，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无望复位。但目下国内与国际情势是否适宜以武力解决藏事，似有从长研讨之必要。”^[20]可见，沈宗濂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热振抱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其关键原因，恰是因为他希望由索康·旺钦才旦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改组。而索康·旺钦才旦正是罗良鉴、徐永昌口中的“实力派”，徐专门谈到：热振势力远弱于索康·旺钦才旦。他们无疑是受了沈宗濂的影响。实际上，魏龙在报告中就曾提到，沈宗濂在藏时就已开始部署支持索康·旺钦才旦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魏龙对这一计划表示质疑，认为“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21]。

三、选择性“内向”

上面提到的索康·旺钦才旦就是本文探讨的人物。国内外学界对此索康·旺钦才旦的讨论不多,主要局限于对其家族的介绍上,如毕达克(Luciano Petech)的《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22]、郭卿友编的《民国藏事通鉴》^[23],巴桑旺堆的《关于一份西藏贵族名录档案——兼述 10 户大贵族家族历史传承》^[24];也有部分提及索康·旺钦才旦政治活动的著作,如周伟洲、周源主编的《西藏通史·民国卷》(上)^[25]有提到索康·旺钦才旦在康藏纠纷中的角色,陈谦平主编的《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26]简略记载索康·旺钦才旦主持下的索康家族对热振活佛的敌意,戈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27]则叙述了索康·旺钦才旦在“外交局”期间的一些动作。

如我们所知,索康·旺钦才旦是颇具争议的“外交局”俗官负责人,索康是世家名,藏名是罗桑巴登,有一个汉文名字叫汪启荣。^[28]他与在西藏的汉族人应该说打交道比较多。这源于其家族索康府的临街铺面,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盛极一时的汉商北京商行(其实这些商店的老板并不都是北京人,而是河北人)。主要销售京津和江浙出产的绸缎、瓷器、古玩,工艺摆设玻璃器皿等,他们也购进西藏的羊毛、牛尾、牛绒等销往内地或出口国外^[29]。索康·旺钦才旦被认为是西藏地方的实力派,其长子索康·旺钦格勒是现任噶伦,其次子是一位研读过国民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藏军代本;另外,昌都总管宇妥及西藏出席国大首席代表古桑子(即凯墨)等,皆为索康·旺钦才旦的姻亲。这些关联都指向噶厦“幕后的操纵者”正是索康·旺钦才旦。^[30]号称“西藏通”的英国人黎吉生与沈宗瀚的看法相似,也认为“噶厦在很大程度上被他(指索康·旺钦才旦——笔者)的意见左右,并将事务交由他安排”^[31]。

沈宗瀚在西藏时间不长,与索康扎萨如此信任,应该与沈刚到西藏,急于寻找西藏方面可依赖的人有关,而索康恰是噶厦中一位“欢快而又聪明的官员”。^[32]加之,沈宗瀚认为索康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是有头脑的。如,他认为“麦克马洪线”问题是英国“大虫吃小虫”的行为^[33]。索康要求英国立即撤退其在色拉关南部达旺地区、锡昂(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和门尼克莱北部察隅河流域所设立的一切兵营和哨所。^[34]再如索康之子索康·旺钦格勒曾密告沈宗瀚只要抗日战争有转机,他对中央即有拥护表示。^[35]

其实并非只有沈宗瀚这样认为,国民政府官员中与索康·旺钦才旦打过交道的,多认为其“内向”,对噶厦有操控能力,比已经失势的热振活佛强得多。时任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陈质平报中央“闻最近拉萨举行之西藏全体政治会议席上,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札萨曾极力主张外交应归中央政府,外交局应即撤销。如不从其主张,彼即辞职。”^[36]他在电文中还特意介绍了索康家族的影响力。

显然,索康·旺钦才旦确实有其特殊的才能和影响力。

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先生曾作为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科长,在西藏待过几年。他如此评价索康:“札萨则与内地的接触较多,所以对中原方面,尤其是川康一代的政情人事,较为熟悉,并且他还说得相当好的一口四川话。现在他担任的职务,是外务局的主管,为人除精明干练之外,还带上充分东方味的所谓圆滑。他有三个已成年的公子,都整整齐齐”。^[37]柳先生还特别谈到索康家族的 3 个儿子,一个是噶伦,一个是代本,一个是僧官。扎萨夫人是拉加里家族(据传就是松赞干布的后裔),“所以这三兄弟不但是僧、俗兼有,并且还是文武俱全。……索康噶伦之妻,是上文提过的耶谿(达赖家属)之一的宇妥台吉的亲妹。这宇妥台吉又娶的是索康噶伦的亲姐,所以是亲上加亲。碰巧索康札萨与宇妥台吉都曾当过多年的昌都总管,所以对这东路的情形最为熟悉。索康札萨的亲弟,是出赘给凯墨巴为婿的,这凯墨巴一般都用房子名改称为古桑子,亦是一个出赛南巴的大族。按照西藏奇特的风俗,这家便以这人赘的索康为正统,现在已当到了札萨,其职务为盐茶局主管。他的妻弟,即凯墨巴之本宗,便是那第二席的扎什戴琿,所以这扎什营的两名

戴琫，都出在这一个集团内。而尤其有趣的，是这凯墨巴家的女儿，又嫁给了另一大族帕拉为主妇。这帕拉又是被公认的德本密宗之一，有三兄弟。居长的是僧官，就是现任重业秋波（又译作仲译钦莫——笔者注）。第二位是俗官，即娶凯墨巴小姐的，达赖卫队营的统领，即所谓古松戴琫，地位比扎什戴琫尤高，是一切戴琫之首席。第三位管理家务，就凭这帕拉两兄弟都当到达赖身前的一文一武，其重要性已经可观，再加上这辗转牵连的许多头等古札与权要的关系，这集团的实力亦就不言而喻了。”^[38]

汉僧碧松，即后来的拉萨国立小学校长邢肃芝也和他熟悉，得到过他的帮助。国民政府派往西藏接替专使行署留藏人员蒋致余的高长柱在昌都一带遇阻时也提到“索康与私人情尚称融洽，除馈赠给养物品计值四百余元外，复迭次托其代办给养各物，均经办到”。^[39]他还一度表示据昌都及藏方蔡翻译密称：“索康近以公私环境日感困难，态度回变，已建议噶厦迎弟，确有八成希望”。^[40]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与其关系也较好，能够就一些敏感问题交换意见。^[41]

显然，索康很注意与中央官员拉近关系。沈宗濂看重他，也是合乎情理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戴新三的日记里则说得更清楚：“曾任昌都总管现任外交局总办索康，现拟利用中藏僵局，在昌都造成局势，如中央对藏用兵，彼即向[相]机归顺，复籍中央力量，达彼充任藏王之目的，兹将最近所闻情形录述如次：

（一）新近赴昌都接充总管之宇多，乃索康之婿，此次赴康，携带辎重甚多，偕往人员如绒扎巴、擦底娃，将月令色等均其亲戚，现驻康区各代本，多系索康旧部，观其动作，似有同系人物集中西康，使逐渐形成一种政治局面之倾向。

（二）宇多之妻，传将于藏历六月由索康之子汪青送往昌都。三、四月前汪青曾宣称拟赴内地游历，有人询渠为何不向藏政府要求名义，渠讥其人为不懂政治。是汪青送妹赴康，乃系掩护作用，其目的当在乘机逃赴内地，做政治活动。

（三）据与索康友善之汉僧密悟^[42]云：索康拟籍中央力量图谋藏王位置，故早已与其子汪青等在噶厦立据分家，盖免政治失败累及子孙，其目的当在乘机逃赴内地，做政治活动。现彼在藏极力收买黄金，以备一旦时机成熟，即抛弃拉萨产业驰往昌都，并邀密悟同往，为彼担任汉文秘书，负草拟文电之责。

（四）前年琼让代本革联[职]充军一案，计共有廿三人联名，均未供出，索康似在其中，彼等系反对西藏现行政制，主张政教分治，不许少数垄断政权，实为继龙夏而起之内政改革运动。索康此次果在康区树立局面，势必将此廿三人，重新团结，贯澈[彻]彼等之政治阴谋。总之，索康一系势力雄厚，其言论行动，殊堪注意，最近拉萨盛传玉树增兵，风声鹤唳，或系彼等张大其词，俾做政略上之运用，亦未可知也。”^[43]

于是，沈宗濂“认为西藏噶伦中以索康·旺清格勒和噶雪·曲吉尼玛实力最大，而旺清的父亲、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札萨系幕后操纵者。索康札萨对蒋介石‘素极崇敬，愿在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政治，推行新建设’”。^[44]

于是，沈宗濂最终与索康·旺钦才旦达成了秘密协议：

“（一）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二）西藏军队由中央负责供给军械派员训练；（三）西藏国民党由索康负责组织。”^[45]这一口头“秘密协议”可谓沈宗濂按蒋介石的胃口打造，既不违背蒋在1945年8月发表的将给予西藏地方“高度自治”的声明，也未触及蒋介石对于西藏地方事务的底线，更重要的是它符合蒋介石对于“训政”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要求。沈宗濂还强调了索康·旺钦才旦的诚意，称此时索康已前往边界调查英国侵占中国西藏土地的情况，必要时索康·旺钦才旦可以晋京，面见蒋介石，当面聆听训令。他本人也提出愿意去英国协助中国驻英大使要求英国军队^[46]撤出西藏。^[47]索康还与黎吉生谈到过，在同中华民国政府商谈交涉有关问题时，最好以目前的状况为立足点，不要依据1914年条约。^[48]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还有

人认为“西藏当局，如外事局长及噶伦等深知英帝侵略之害，彼等且有规复大吉林(岭)之意。若我势力(力)扩入，不难使其内向。”^[49]

四、沈宗濂的退意

事后看，沈宗濂对索康·旺钦才旦真实政治态度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偏差，对他的谋略野心也认识不足，仅凭借他对蒋介石“素极崇敬”，并且“能通汉语”^[50]就认定索康倾向中央是极其武断且片面的。毫无疑问，沈宗濂对索康·旺钦才旦的支持，还包含他对自己前途的考虑。

沈宗濂到藏初期，雄心勃勃，有着极大的抱负。但数月后，他收到蒋介石让陈布雷给他的复电，谓：“奉委座指示，目前国内局势复杂，故西藏问题只能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吾兄才华卓著，年来在藏多有建树，弟所钦佩，唯按之现实，只能以无事为大事，以无功为有功。区区愚见，谅蒙明察。”沈宗濂是聪明人，接到这个复电后，知局势既已如此，事已断不可为。自此他心灰意冷，开始有脱身之考虑。^[51]

或许是由于双方皆受过精英教育的背景，沈宗濂在藏期间与几位英国官员的私交不错，他们也这位哈佛毕业颇为欣赏，在闲谈中，沈宗濂数次表达了他不愿在拉萨工作的想法。“他不喜欢拉萨并且认为这里对身体健康不利。他希望早点结束在这里的工作，然后作为经济专家在战争结束后自由地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52]作为主任秘书接替沈宗濂的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也持类似的看法，“沈宗濂感觉藏事棘手，亟思早日脱身。”^[53]沈宗濂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提出，由于身体原因，“请调回中央工作”^[54]。沈宗濂在南京期间，曾陪同西藏地方代表及嘉乐顿珠晋謁蒋介石。此前，他还拜访了一向关注边疆事务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谈及他在拉萨工作一年有余的情况与他对治藏问题的认识。他表示，既然在藏事方面不宜有所行动，而他自己又患有心脏病，不适合久居高原，因此请陈布雷代为向蒋介石表达辞职之意。蒋介石同意沈不妨暂时休息，以后将另有任用。1947年初，上海市长吴国桢邀沈任市府秘书长，此项任命自然是出自蒋的授意。^[55]

来自另一个渠道的消息表明沈宗濂的内心想法。据嘉乐顿珠回忆：他在南京得知热振死讯后，即感觉应该把热振要求其传达的口信（依靠中央，争取复位）转告蒋介石。但是，沈宗濂建议他不要这么做。沈认为覆水难收，还提醒嘉乐顿珠如果告诉了蒋介石，消息泄露，其母亲和达赖喇嘛都可能受难。对此，嘉乐顿珠心生芥蒂，认为沈完全站在达扎的一边，而且他一夜暴富，在没有足够资历的情况下被提拔为上海市长（沈宗濂并非市长——笔者注），可能收受了贿赂。^[56]

沈宗濂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然带有甩包袱之意，他很清楚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支持热振活佛重掌大权，那么与拉萨各贵族、寺院均有良好关系的他必然被再次派往拉萨，这与他“作为经济专家在战争结束后自由地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的意愿背道而驰。而如果在他的影响下，中央政府决定支持索康·旺钦才旦，以较为缓和的姿态改组西藏地方政府，那么西藏的局势就会平稳许多，他也不必重返拉萨。甚至，沈宗濂还进一步提出，在国民代表大会之后，“宣慰专员似以章嘉活佛充任为宜”^[57]。直到1947年5月初，沈宗濂还在建议蒋介石利用热振活佛之事，实力支持索康扎萨改组西藏地方政府。而索康颇有计，婉转表示“此事尚待考虑”。^[58]

五、最后的机会

1946年8月14日，拉萨站军统负责人魏龙转来热振活佛给蒋介石的急信，信中称：“目前所存实力尚堪一战，惟于时机不知是否得当，否则职当晋京一行以避其锋。”^[59]据此推断，热振活佛已经在忧虑个人的安危，同时也认为他的实力并不逊于达扎，但还是需要征询中央政府的意

见，确保其采取行动时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而沈宗濂对此则表现得漫不经心，认为如果热振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可以派出飞机前往拉萨“示威”。^[60]

军统内部也认为热振活佛有能力复位。从驻拉萨的魏龙及侯国柱的报告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对在中央的帮助下使热振成功复位抱持较为乐观的态度，并认为：“索康及其党羽，均为显著之亲英派，彼等对英之关系绝难放弃，而在彼策划下改组藏政府之后，恐仍将采取骑墙政策，对外交权及国军之入藏，彼亦不能确切保证。故索康之计划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他们指出，要想彻底解决西藏问题，“阙为扶助热振之复位”。他们认为，热振复位，“系以挽救将沦于亲英之西藏宗教为重心，如能成功，则政令之推行可由我中央派员实际主持，外交问题亦均可由中央决定，绝无建立中英双方亲善关系之顾虑”。他们坚持，“西藏问题，从各方面观察，俱以从热振方面着手较为有利。而且确有把握”。^[61]之后的事件发展也确实印证了军统拉萨站的情报是正确的。查询材料证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持同样意见。

1946年9月5日，沈宗濂的意见得到肯定。作为蒋介石亲信和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与总统府文官长吴鼎昌连日商讨后，基本上同意了沈宗濂与徐永昌的意见，先与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西藏代表商谈。吴忠信有这种意见并不奇怪，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他在藏期间就听到了一些关于热振的负面信息。如1940年12月27日，孔庆宗、朱章等人往晤热振。在朱章看来，热振活佛频以“南京有无拉萨大”及“内地是否到处皆山”相问，其作为“西藏一代之权威，于内地情况，尚不能了然于怀也”，^[62]这与后来吴忠信对热振的观感颇为类似，很难说朱章等人未就此与吴忠信交换过意见。2月28日，吴忠信答宴热振时，发觉“热振实心亲汉，人亦天真”。^[63]但等到4月12日，彼此再见之时，吴忠信对热振的印象则开始变化，“以主全藏政局之人，而常识缺乏如此，可为浩叹。”^[64]并对其处境感到担忧，认为“余代热振危矣。且热振贪财之名传遍全藏，复又好色，结怨必多，余不知其何以善后也。”^[65]显然，他们已对热振活佛在西藏地方的统治力失去信心。

这期间，热振活佛其实一直在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当藏军前来抓捕时，热振活佛并无丝毫反抗之意。国民政府此时亦毫无作为，遂引起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亲中央势力的不满。同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报告称这是一场亲英派与亲汉派之间的斗争，如果中央没有后续行动，“则不仅丧失一般藏胞对中央之威信，即十余年来对藏联系工作之成就亦将毁于一旦”^[66]。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在后来感慨万分地说：“自此事发生，办事处将所得消息陆续电告沈宗濂转呈蒙藏委员会，请其注意尽速策划有效方法，解决纠纷，因此次达札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国主义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不可忽视。在色拉寺与嘎雪巴相持中，喇嘛一面抗拒，一面以全体僧众名义写信给办事处，请转呈中央，速派军队和飞机进藏，援救热振。在藏汉人则要求中央，无论如何要设法保护热振的生命安全。我向南京报告，建议一面设法调解，一面派军队在西康昌都一带，往来游戈，遥为声援。一时均未得到蒙藏委员会或沈宗濂的答复和指示。”“西藏地方政府任意颠倒事实，目无‘中央’不惜与之决裂，则是昭然若揭。我致函沈宗濂痛论此事，并提出辞职，未得答复。”^[67]

直到1947年3月，国民政府方面才出现了新的态度转向。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第一次公开呼吁改变对藏政策。他断言，目前的西藏地方实际上是在推进分裂运动。他认为达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提交的材料已充分揭示了其真实意图。此外，拉萨现在正打算派出另一个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泛亚洲会议”。他提出，南京政府支持热振活佛重掌摄政之位的时候已经到了^[68]。

1947年4月25日，喜饶嘉措大师致信蒋介石，与陈诚的看法相似，也认为热振被捕背后其实是中英两国的竞争，此时“亲华派之处境当极困难，若不予以援助则三大寺等亲华派之信心将丧失”。^[69]从后来的情况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喜饶嘉措大师的信对蒋介石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蒋

介石日记》中，我们看到他对喜饶嘉措大师的治藏意见是赞同的，认为“颇有见解”。亲信陈诚的意见与大师不谋而合，致使蒋介石立即要求保密局郑介民拟定藏事解决方案。

次日，国防部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和军事地图，等待蒋介石批准。在这个计划里，在甘肃的两个国民党控制的装甲部队将调集到青海南部，同时刘文辉的部队和康区当地的武装力量向西开进，占领拉萨控制的金沙江西岸。此外，国防部还积极建议蒋介石，选择一名具有军事背景的合适的官员担任驻拉萨的代表，以控制军事行动后的局面。^[70]

但是，一切都晚了。1947年5月8日，热振活佛圆寂。

六、研判失误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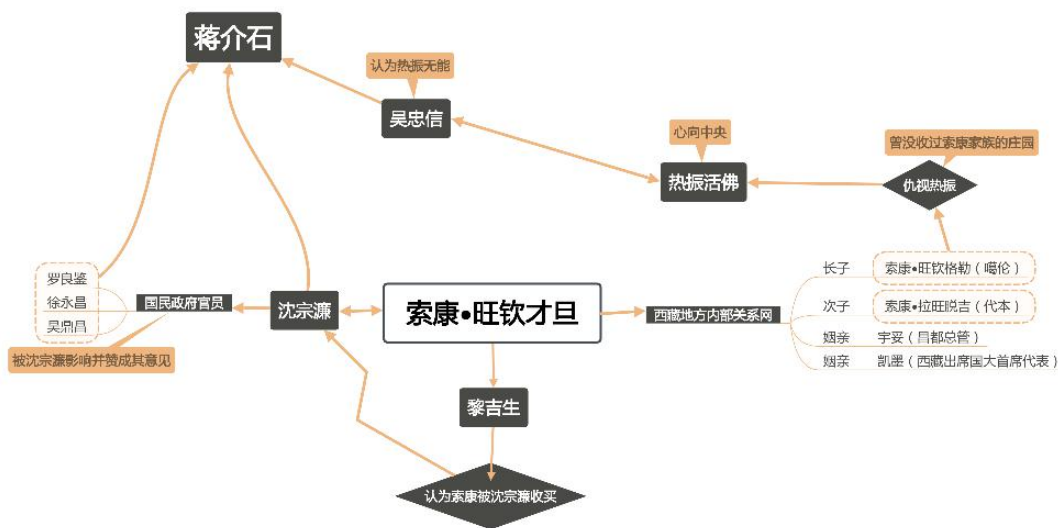
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原因很多。而沈宗濂作为处理藏事的一线高级官员自然难辞其咎，对于热振活佛被“抛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热振事件”及其危机出现前，他为了实现自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利用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来夸大西藏地方政府的“内向”态度以贬损热振活佛。

另一方面，沈宗濂推动“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了让他更快地脱离有关西藏的事务，返回内地从事他本职的经济工作，以实现他个人的政治抱负。沈宗濂的这一想法在他与达扎的私下会见中也曾向其表露，甚至还被英国人所获悉，“据进一步汇报，沈先生说怀疑他是否还能像摄政一样总是参与国事，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希望能够返回内地，拥有他之前的权力”^[71]。如果支持热振复位，那么沈宗濂将很有可能不得不返回拉萨，按照热振活佛承诺的“请中央派员指导”^[72]。我们从档案中看到：沈宗濂认为“热振在藏势难复位。中央只宜对其虚与委蛇，以为应付达札之一工具而已”。^[73]在郑介民、吴鼎昌等主管官员接到西康省刘文辉主席关于热振已派代表的报告后，仍在质疑“其本身究能代表热振何程度，颇成问题”^[74]“该代表两人实系西康商人，究能代表热振与否，亦颇成问题”^[75]，而这些怀疑都提到是沈宗濂的看法。最终，蒋介石未能见到热振活佛的代表，使热振活佛寄希望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条渠道被堵死。

沈宗濂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说服蒋介石选择了索康·旺钦才旦。对此，任乃强先生在其《检讨最近藏局》一文中直率地指出：“三十二年我政府召回孔庆宗氏，代以委员长侍从秘书沈宗濂，以为便可挽回颓局。殊沈氏昧于藏情，其颓势更较孔氏为速。未几即因无法立脚，潜回内地教书，仅留小职员数人在藏，闭门株守而已。”^[76]如果将中英两国的档案和时人的记载对比来看，那么自然地得出以下结论——索康·旺钦才旦是政治上的“双面人”。当沈宗濂在拉萨时，英驻锡金政治官员霍普金森怀疑索康·旺钦才旦“处在中国人的掌控之下”^[77]，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的情报也显示索康“极力主张外交应归中央政府，‘外交局’应即取消，如不从其主张，彼即辞职”^[78]。当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影响渐增的时候，索康·旺钦才旦又不断向黎吉生表达“独立”的愿望。^[79]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索康扎萨在藏素以亲英为名”^[80]。但直到1947年，驻藏办事处还在用密电报告沈宗濂，索康扎萨的近况。^[81]

我们从索康扎萨与周围关系入手，绘制了一幅简图，比较清晰直观地展示了他何以有如此影响力的（见图）。最终这一切影响了国民政府中枢对热振活佛的态度，对西藏“热振事件”研判的准确性。

1947年“热振事件”发生之后，国民政府此时的心境可以用与热振活佛个人关系极好的吴忠信的态度来做一说明，即尽管感慨“此次变生仓卒，中央竟因交通及力量所限，不及援救，此对热振实抱无穷遗憾也，余与热振私感尤深，此种痛恨不能忘也”，^[82]但骨子里仍然认为“现在热振势力毫无，且其名誉太坏，以中央现在内外之环境，决不能亦不便对藏办诸武力，尤其西藏出席国民大会代表现在内地，而印度又已独立，西藏局势有将转之可能，更不能扶助失势之热振，而得罪有实力之现藏政府”。^[83]



实际上，热振活佛的去世，对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影响极大。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章甚至提出辞职一事。有人自拉萨撰稿，提到“自从热振变发生之后，全藏百姓莫不引颈翘首中央之救助，结果中央对藏政府说的硬话的电报都没有来。”^[84]这使得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处境更加尴尬，中央威信严重受损，特别严重影响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这不是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支持热振活佛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支持的问题。影响热振事件走向的真正原因是对索康·旺钦才旦的误判。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不同政治倾向的人是复杂的、多元的。

历史客观存在，学者也多秉持公正的态度，但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则必须依靠扎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既包括档案，也包括需要甄别的口述史料。西藏“热振事件”的幕后，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注释：

- [1] 如陈谦平：《“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民国档案》2006年第01期，第90-98页。陈谦平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0-460页。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378-388页。
- [2] 《西藏政变续报传热振将遭毒手中央应严电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兵赴青康藏边境》，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四），典藏号：001-059200-0012，第40页。
- [3] 《蒋介石日记》，1946年11月16日。
- [4] 《蒋介石日记》，1946年12月28日。
- [5] 熊坤静：《新疆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2010年第7期，第46页。
- [6]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呈西藏事变之内情与对策》，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典藏号：001-059200-0011，第66-68页。
- [7] 《吴鼎昌关于热振被捕情报的签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典藏号：001-059200-0011，第68页。
- [8] 《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1页。

- [9]《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6-18页。
- [10]《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1页。
- [11]《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4页。
- [12]《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3页。
- [13]《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4]《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5]《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6]《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1页。
- [17]沈宗濂（1898-1978）：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后来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总务司司长，1941年末，沈宗濂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四组任秘书，为蒋介石出谋划策。1943年10月，沈宗濂被蒋介石派任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后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 [18]《蒋主席饬外交部，转知印督，驻藏沈处长将伴同藏籍国大代表赴新德里》，《外交部档案业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编印，第268页。
- [19]《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40页。
- [20]《热振呈达札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27页。
- [21]《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11页。
- [22][意]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沈卫荣、宋黎明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 [23]郭卿友编著：《民国藏事通鉴》，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 [24]巴桑旺堆：《关于一份西藏贵族名录档案——兼述10户大贵族家族历史传承》，《中国藏学》2014年第S1期。
- [25]周伟洲、周源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 [26]陈谦平主编：《西藏百年史研究》（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27][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 [28]邢肃芝：《雪域求法记》，三联书店2003年，第110页。
- [29]廖东凡：《拉萨掌故》，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 [30]《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59页。
- [31]FO 371/53614,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3rd April 1946.
- [32]房建昌：《有关西藏烟草的嗜吸及鸦片之禁的若干史实》，《中国边疆史地》1995年3期。
- [33]FO 371/46121, From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24th June 1945.
- [34]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三联书店，2013年，第348页。

- [35] 《沈宗濂致陈布雷函电》，台北“国史馆”档案，0592/4417.01-03，藏务，微卷 419/1841，1945 年 4 月 23 日。
- [36] 《陈质平为西藏派遣国大代表等事复外交部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3002-3003 页。
- [37] 柳陞祺：《柳陞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474 页。
- [38] 柳陞祺：《柳陞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474-475 页
- [39] 夏军选辑：《高长柱赴藏途中日记节选(上)》，《民国档案》2013 年第 1 期。
- [40] 夏军选辑：《高长柱赴藏途中日记节选(上)》，《民国档案》2013 年第 1 期。
- [41]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第 133 页。
- [42] 密悟：（1904-1966）俗名霍履庸，在西藏颇有影响之汉僧。曾先后在甘孜大金寺，西藏哲蚌寺学经，曾获“拉让巴格西”。1949 年后，曾化名志清法师，为西藏和平解放做出过贡献。
- [43] 王川：《戴新三 1943 年〈拉萨日记〉选注整理与初步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 [44] 陈谦平：《民国对外关系史论 1927-1949》，三联书店 2013 年，第 422 页。
- [45]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28 页。
- [46] 指驻江孜和亚东的英国贸易代表处的卫队。
- [47]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30 页。另见 FO 371/53614,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entse and Officer in Charge,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Gangtok, 3rd April 1946.
- [48] FO 371/41589, From H.E. Richardson, Points arising from discussion with the Tibetan Foreign Affairs Bureau on 16 September 1944.
- [49] 秦和平：《一个“反帝欲汉藏两族和睦而爱国佛教者”——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密悟(志清)法师》，《社会科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 [50]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28 页。
- [51] 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第 151-153 页。
- [52] FO 371/41585,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4th October 1944.
- [53]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08-140 页。
- [54]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31 页。
- [55] 张瑞德：《「欽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1943-194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7 期，第 59-96 页。
- [56] Gyalo Thondup, and Anne F. Thurston,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Dalai Lama's Brother and His Struggle for Tibe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5, p. 84.
- [57] 《热振呈达扎对其妒视益深近迫益急及派代表晋谒请示应付藏政府方针》，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30 页。

- [58] 《陈锡章致沈宗濂电》，台北“国史馆”档案《中藏关系》，卷 60/E38/023，1947 年 5 月 8 日。
- [59] 《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59 页。
- [60] 《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并附西藏前任摄政热振呼克图函》，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2 页。
- [61] 《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11 页。
- [62]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M]，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第 12、15 页。
- [63] 《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271 页。
- [64] 《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 299 页。
- [65] 《吴忠信入藏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第 298 页。
- [66] 《西藏政变续报传热振将遭毒手中央应严电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兵赴青康藏边境》，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四），典藏号：001-059200-0012，第 25 页。
- [67] 陈锡章：《西藏从政纪略》，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108-140 页。
- [68] 《陈诚呈为求西藏内向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10，第 41 页。
- [69] 《喜饶嘉措呈援助热振办法》，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典藏号：001-059200-0011，第 51 页。
- [70]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呈西藏事变之内情与对策》，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三），001-059200-0011，第 66-68 页。
- [71] FO 371/46123, SECRET NEWS REPORT,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19th July 1945.
- [72] 《西藏问题解决之途径与热振活佛谈话笔录及对扶助热复位问题意见》，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一），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11 页。
- [73] 《西藏政府派兵拘热振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8 页。
- [74] 《西藏政府派兵拘热振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8 页。
- [75] 《西藏政府派兵拘热振及色拉寺僧徒暴动情形》，台北“国史馆”档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二），典藏号：001-059200-0009，第 65 页。
- [76] 任乃强：《检讨最近藏局》[J]，《康藏研究》（成都）1949 年 7 月，第 27 期。
- [77] FO 371/46123, From A. J. Hopkinson, British Mission, Lhasa to C.B. Duke, Joint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of India, 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Delhi, 31th October 1945.
- [78] 《驻加城领馆呈藏代表经印赴京之艰难、霍金森之挑拨及索康家族在藏势力等情由》，《外交部档案业书——界务类》第五册西藏卷（一），台北“外交部”编印，第 266 页。
- [79] IOR L/P&S/12/4197, Richardson Report of Lhasa Mission in 1946, January 16, 1947.
- [80] 《荣增打扎摄政以来西藏一瞥》，《申报》，1948 年 2 月 15 日第 5 版。

- [81]《陈锡璋为索康和西藏代表往晤尼赫鲁请助独立等情致沈宗濂电》，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七册，第2867-2868页。
- [82]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先生日记》，1947年5月20日，系列名称：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230/5617.2。
- [83]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吴忠信先生日记》，1946年9月4日，系列名称：一般档案，馆藏号：一般230/5617.1。
- [84]马明孝：《热振是怎么死的》，《西北通讯》第二卷第二期，1948年1月31号，第30页。

【论 文】

近代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书写作与认知研究¹

徐百永²

摘要：近代以来，西藏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渗透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对于“西藏问题”，近代知识精英奋笔疾书，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西藏的渗透以及西藏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中突出问题的原因，认为英俄等国的侵略渗透及晚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失误是造成西藏成为“问题”的主要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建言献策。相关认知对于现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藏；西藏问题；精英；文书写作

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持续渗透和侵略下，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相对疏离的局面，如何解决中国的边疆危机，巩固主权，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展开了对于边疆地区内容广泛的书写，其内容不仅仅涉及边疆族群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等，而且就如何解决西藏等边疆地区相对“自主”于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的局面也积极进行了探索。这些文书写作大大拓展了内地社会民众对于边疆的相关认知，丰富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边疆认知的话语和内容，对于近代中央政府处理相关问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近代边疆文书写作中，有关“西藏问题”的撰写是其中比较突出而重要的方面。近代产生的所谓“西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清末、民国）所包含的含义并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都在于近代中央政府如何排除外来列强的干扰，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巩固边疆和领土主权。目前学术界关于近代西藏文书写作的研究与数量繁多的民国文本相比，仍少之又少，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简金生分析了民国时期藏人在涉藏文书写作中所展现出的西藏认知，论述了汉人知识精英在书写中对于西藏女性的“情色化想象”；李健以五本《西藏问题》著作为例，分析了“西藏”概念的涵义；朱丽双分析了民国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员对于西藏的文本

¹ 本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²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

书写与想象；央珍、强俄巴·次央分析了民国时期内地人眼中的藏族妇女形象及其特征；杨黎浩阐述了内地生活的藏人对西藏有关主题的看法，等等。¹ 笔者以为，目前的研究中对于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西藏问题”书写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而从近代民族国家的视野审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近代知识精英在面对愈演愈烈的“西藏问题”时所作出的积极努力。他们所呈现的文本深刻揭示出近代知识精英思考、看待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情境。

一、关于“西藏问题”如何产生的文本书写

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西藏问题”。“内地与西藏发生关系，远者无论，其在清代统治二百余年间，对内对外，领土主权，均已确定，任官驻兵，政令推行，地静人安，无所谓问题也。”² 而至清末民国时期，远处中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在英国、俄国等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和渗透下，逐渐成为近代中央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统治的边疆区域，演变成对今日中国的边疆治理仍在产生影响的所谓“西藏问题”。从目前可见的近代文本可知，比较早的明确将西藏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表述的文章，应该是1906年上海《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杂志之《英俄协商西藏问题》，以及同年《法政杂志》转载的《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的《西藏问题》³。此后“西藏问题”逐渐在内地报刊上频繁出现，并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主题。当然精英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书写在此之前已经大量涌现。

从文本来看，精英们最开始更多关注的是西方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和侵略，其中英俄在西藏的角逐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早在1877年，上海《万国公报》便刊文称，英国驻华官员向李鸿章提出“准英员由印度至西藏查勘路程”，英人向西藏的渗透便受到时人的关注。⁴ 1888年隆吐山事件前后，英国和俄国已经开始显露出角逐西藏的姿态：“天下各埠西人无所不通，不通者只藏地耳。然英早欲于印度赴藏通商，而俄皇前亦派员至藏测量山川，博考物产并绘地图，以知其中款要”，并预言“中若不预为布置，恐将来或不免因之召衅也”。⁵ 此段言论已经提醒国人，对于以英俄为主的帝国主义国家渗透西藏，如不未雨绸缪，恐导致有关西藏危机的产生。1898年《知新报》接连发表多篇有关英俄渗透西藏的文章，诸如“窥伺”“议取”“垂涎”等字眼见诸标题，⁶ 引起了社会舆论对西藏的广泛关注。时人已经认识到，西藏者，“英国得之，则可以固印度之门户而为之屏障；俄人得之，则可以拊印度之背而扼其吭，以为高屋建瓴之势。”⁷ 他们预言：“不出五稔，西藏其为英、俄角逐之战场矣”。⁸ 20世纪初，“两大强国逐鹿于世界第一高原”

¹ 相关研究成果如：简金生的《藏人论藏：民国时期藏人的西藏观》（《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50期，2013年12月）和《民国时期汉人对西藏妇女的情色化想象》（《新史学》第25卷第3期，2014年9月），李健的《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从1926-1935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朱丽双的《民国政府的西藏专使（1912-1949）》（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央珍、强俄巴·次央的《民国时期内地人眼中的藏族妇女——以近代妇女期刊的有关刊载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杨黎浩的《国民政府时期藏人所论藏事浅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以及成发强的《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入藏官员的西藏书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陈向的《民国时期内地藏人有关西藏的文本书写与认知》（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杨露的《民国时期有关西藏历史地位的文本书写与认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等硕士学位论文皆可参考。

² 孔庆宗，行宪与西藏及西藏问题[J].边政公论，1948,7（1）.

³ 参见《英俄协商西藏问题》，《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年第225期；金葆释译《西藏问题》，《法政杂志（东京）》1906年第1卷第6期。

⁴ 佚名，大英国事：题及由印度至西藏通商事[J].万国公报，1877（470）.

⁵ 佚名，大俄国探测藏地[J].万国公报，1889（11）.

⁶ 相关的文章如《英俄窥伺西藏》（《知新报》1898年第67期）、《英人议取西藏》（《知新报》1898年第71期）、《英人垂涎西藏》（《知新报》1898年第78期）等。

⁷ 佚名，英人侵略西藏[J].新民丛报，1903（31）.

⁸ 佚名，俄兵入藏[J].新民丛报，1903（33）.

的态势已然形成。经历八国联军侵华及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的清王朝已经面临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严重局面”。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在西藏事务处理上所存在的失误也逐渐进入精英们的视野。他们从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视角开始反思“西藏问题”的形成，认为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治治理体制设计上存在缺陷，虚化了中央驻藏官员在西藏的实际权力。如1898年《论西藏弊政》一文指出，清政府在荡平廓尔喀之后，“未能布置尽善，其国政仍归于达赖、班禅两汗僧，有事商之于驻藏大臣”，“遇其所不愿行之事，必推之于三大寺众喇嘛等不允”，造成驻藏大臣难以行使权力。²他们认为，清朝“措置藏事”有“三失”：一是岳（锺琪）威信削平全藏之初，“不能悉其地而郡县之，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二则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后“不能移得胜之师，进临卫藏，变更戎索，悉治以汉官之威仪”；三则在于咸同之乱时，达赖借口剿贼“收三瞻诸地”，“国家多故之秋，未遑诘问”，这些造成西藏人轻视中央，“即无英、俄两国之离间，亦已飞扬跋扈，不可遏抑矣”。³显而易见，精英们惋惜于清朝没有按照内地行省郡县模式治理西藏，认为这是清末西藏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本因素。

除治理体制存在不足之外，精英们还认识到中央派驻西藏的官员多乏善可陈，而且多庸碌无为之辈。“盖天下之事，无生而难者也，必其先漫无布置，无形之中，难端四伏，久之而后发难，然后天下真有不可为之事，而使人踌躇于无可如何。今日西藏之问题，非自今日始也。自雍乾时，勘定西藏，其所定驻藏大臣之权限，其精密完备，为我向来所无有，有人谓此时必有客卿为我谋者，非我之智之所及也。不意徒有其法，而无能胜其任之人，百余年间，西藏之事，如在云雾，中国士大夫，殆无人能详之者，而祸端乃见。”⁴除揭示出清朝治理西藏不得其人之外，也暴露出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清代精英们对于西藏相关信息缺乏了解和认知。不仅仅所派官员不堪其任，更有甚者，驻藏官员任职期间渎职、贪腐等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中央在西藏的权威和声望。1907年，袁仲指出，清朝驻藏大臣例用旗人充之，其入藏，诸处债主多随之往，赴藏者多系“穷宦”，百方罗掘，无财不取，三年瓜代，即满载而归，“藏民视之不啻虎狼蛇蝎，惟恐避之不及。”⁵甚至有人指出，历任驻藏大臣“率以旗员之沉滞者任之，视同远谪，方趋避之不暇，一旦任事，非鹵莽灭裂，即畏葸因循，从无喜功好名之心，安识固国殖民之法。其始不肯办事，其后遂致失权，推原其故，虽由历任大臣之溺职，亦实由朝廷之轻视此官，有以致之。又驻藏大臣，虽亦以二三品大员任之，然权势实远不如督抚，而所入至菲，又不足以资肆应，且窃朝廷之不欲事事。故尤乐于无为。在朝廷方谓如此已足羁縻，初不知空穴来风，事已坏于冥冥而不觉矣”。⁶清朝政府轻视西藏，视之为化外之地的“异域”，而对所派官员的素质、级别均不能满足代表中央治理西藏地方的需要。

此外，在应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对藏侵略时，清政府的手足无措、应对乏力也是重要的关注焦点。有人慨言：“呜呼！大盗伺门，已愈十载，今已入室发篋，主人乃惊顾错愕，何其见事之晚也。”⁵在列强的侵略下，清政府几无西藏事务主导之权，任凭列强掌控事态的发展。时人就此坦言：“吾思之不觉股慄心悸”“今日而始欲拯西藏之亡，则西藏已为英、俄之竞争点，而几无复我容喙之地”。英国等列强在西藏事务上的蛮横无理和强盗行为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忧愤之情。他们批评清政府对于西藏所持有的忽视态度，称：“我得之则为石田，人得之则为腴壤。我忽之若敝

¹ 佚名，英国之西藏远征[J]. 浙江潮，1903(10).

² 佚名，论西藏弊政[J]. 国闻汇编：第4册，1898年1月7日；卢秀璋. 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2.

³ 佚名，藏事危言[N]. 广益丛报，1909-1-1（192）.

⁴ 佚名，论中国不宜委弃西藏[N]. 外交报，1904-4-10（73）.

⁵ 袁仲，西藏[N]. 东京大同报，1907-8-5（2）.

⁶ 佚名，整顿西藏条约[N]. 广益丛报，1908-7-18（175）

屣，人爱之若拱璧。如此而望其万世为我藩属，其可得耶？”^[1]将西藏视为“石田”“敝屣”同样揭示出清政府及精英们在理念上对西藏认识仍处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

民国以后，西藏危机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反而进一步造成了西藏与内地相对隔离的不正常局面，西藏成为游离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的边疆地域。精英们进一步探讨了西藏危机的产生问题。他们依然关注英国对“西藏问题”的出现所扮演的角色，如王履康认为，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乃是英国十八世纪来侵略的结果”，从光绪末叶到辛亥革命之间，“西藏问题，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陷入了更难解决的地步”，西姆拉会议、康藏纠纷、青藏纠纷均使得“西藏问题”更为复杂化。^[2]英国利用西藏地处西陲、交通不便的地域特点，造成所谓的“西藏问题”，致使“西陲国土，大有分裂之危”。^[3]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渗透是造成“西藏问题”的主要外来因素，这成为精英们的基本共识。

精英们关注更多的则是总结清末民国以来“西藏问题”的演变态势，总结中央政府处理藏事中的种种失误，相关总结更为深入。1925年8月，林兢在为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所写的跋中，总结认为“藏事之败坏”，“非坏于国家兵力之不足，亦无怪英人手段之狡狴也”，认为张荫棠在藏“以亲善妥协政策”“甚得藏人欢心”，而联豫“以不便于己，多方攻击，政府不辨是非”，使张去职，“自是以后，所有长官遂鲜有不僨事误国者也”；辛亥革命时川军在藏焚烧抢掠以及1917年彭日升因藏人割草“妄杀无辜”，“均足使藏人起离畔之心，而收拾益竟为难也”。^[4]在其看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失当之举措是藏事败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在治理西藏事务上所派官吏的种种误国行为使得“西藏问题”愈演愈烈，而形成与中央隔离的不正常局面。长期从事藏事处理的蒋致余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坦言：“考藏事之败坏，乃一由于有泰之措置乖方，再由于联豫之威福擅作，三由于钟颖之多端压迫勒索，而民元驻藏川军之恣意焚杀劫掠，尤为其致命之伤。时至今日，达赖及全藏民众，虽对于有泰诸人及驻藏川军，尚犹不无余愤。”^[5]曾发表多篇有关西藏文章的冷亮指出，“西藏问题”的产生“半由英俄之侵略，半由边吏之昏庸”，“若无有泰之愚庸昏愤，若无川军之入藏骚扰勒索，若无联豫钟颖之相互交恶，而清廷不革除达赖喇嘛名号，藏事之败坏，定不至若是之恶劣”。^[6]他们言虽有异，所举事例不尽相同，但显然都认为，中央驻藏官员、军队的失当行为及中央政府治藏失误是近代西藏危机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除上述内容外，精英们还从更为深层次的治理观念上予以反思。1930年，白眉初指出清朝治理西藏的“放任主义”是造成西藏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认为“自清初以迄今兹，乘三百年，此为世界所共见，独可惜者，吾国政府，对藏一切治理，例取放任主义，从未积极干预，使归同化，以故西藏人民，保守千百年来传统的闭锁习惯，有如昔日，不期乾嘉之间，英人侵略印度成功，遂起而侵略西藏，不遗余力”。^[7]清朝对于西藏的羁縻放任政策造成了后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社会发展滞后，而没有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从而为侵略西藏的英国殖民者所利用。尹扶一在《西藏纪要》一书中也认为，“西藏问题”的产生印证了“必空隙而后生风，木腐而后致蠹”的道理，坦言“无可乘之隙，则外力决无由突入，既偶触之，亦必蹶然自返矣”。^[8]1948年，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李有义撰文犀利地指出“为什么千余年来和我们依为唇齿的边地竟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

^[1]佚名，英国与西藏之交涉[N]，江苏（东京），1903-10-20（7）。

^[2]王履康，西藏问题之检讨[J]，新中华，1934，2（18）。

^[3]王洁卿，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边事研究，1936，3（）6。

^[4]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跋[M]，出版信息不详，1925。

^[5]蒋致余，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M]，南京：大陆印书馆印行，1932，第68页。

^[6]冷亮，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J]，边事研究，1937，6（1）。

^[7]白眉初，西藏始末纪要[M]，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年第2卷第1页。

^[8]尹扶一，杨耀卿，西藏纪要[M]，蒙藏委员会编译室印行，1930，第151页。

沐浴”？他认为清代对藏政策，“一面利用宗教的麻醉，以高爵厚禄怀柔活佛喇嘛，一面则分区驻军加强军事上的控制，在文化方面则反有意的使它和内地分离。……边疆大吏都一律任用满人，而且多系宗室以防携贰，这些设施虽然加强了清廷的直接控制，在文化上反而使中原和边地益形隔离了。所以在辛亥鼎革，满清的统治推翻后，中原的势力就一扫而光，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假定在满清统制的三百年中，稍稍注意到文化的沟通，今日也许根本没有所谓‘西藏问题’了。今日的‘西藏问题’正是在吃满清对藏政策的后果”。^[1]

综合来看，西藏之所以成为“问题”，由内外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在近代精英群体的视野中，西藏成为边疆问题既是有清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过程中的失措之所致，也是近代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西藏渗透和侵略所导致的结果。

二、建言献策——解决“西藏问题”之途径

在近代精英群体的认知中，西藏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藏者，吾中国地理上最占形势之领土也”；“我有西藏，我自可保我吭，而护我背。人有西藏，人遂得扼我吭，而拊我背。则我不可不经营西藏”。^[2]“西藏存，实乃本部之西藩，西藏亡，而本部孤立，断无幸存之理。有西藏乃有中国，无西藏是无中国也。”^[3]作为中国西部屏障的西藏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清末精英们痛心疾首地提醒国人：“若再不思对付之，彼三藏膏腴富地，宝藏高原，将真非我所能有。”^[4]他们呼吁全体国民关注和关心西藏安危，共同思考如何巩固中国对于西藏之主权。对此，民国时期的精英阶层依然认识深刻。华企云就曾指出：“吾人必不可以其僻处荒徼，而不加闻问”，“良以西藏之地形，足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以制我全国之死命焉。故吾人于西藏当以中国之西藏目之，不当以荒徼异域视之。”^[5]华氏所言，揭示出当时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共和时代近二十年，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治边思维之中，将西藏视为“荒徼异域”的观念也依然存在。而这种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他们认为，对于西藏，再不应该沉浸在传统的徼外之观念视之，应该秉承的观念是西藏是中国之西藏，而并非已然脱离中国控制及与中国没有隶属关系之西藏；要认识清楚“西藏是整个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构成份子，她的荣辱，她的存亡与整个中国前途有莫大的关系”。“西藏问题，决不是中国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帝国主义与整个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同时西藏问题不独是西藏民族的前途，是整个中华民族革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在此严重意义之下，凡属国人均有瞭解西藏问题及负有解决问题的使命。”^[6]举安的这一将西藏民族与中华民族视为一体的主张与著有影响较大的《西藏问题》的陈健夫不谋而合。陈健夫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华民族的试金石”，“中华民族假若是要保持长久的生命的话，就要积极的把它解决，否则的话所谓中华民族不就有昙花一现的危险么？”同时指出“西藏问题是中国整个的问题”，西藏关系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不能单纯的固执着西藏而论‘西藏问题’，必定要抓牢着整个中国问题的核心再来细心探讨”。^[7]

在思想意识上统一如何认识西藏地位重要性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解决“西藏问题”。所谓“西藏问题”，民国时期其所包含的内容与清末有所不同，清末偏重于如何加强对西藏

[1] 李有义，西藏问题之分析[J]. 边政公论, 1948, 7(3).

[2] 荣升，经营蒙藏以保存中国论（上）[J]. 东京：大同报，1908（7）.

[3] 佚名，筹藏私议[N]. 广益丛报，1908-6-28（173）.

[4] 袁仲，西藏[N]. 东京大同报, 1907-8-5（2）

[5] 华企云，西藏问题[M]. 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244-245页

[6] 举安，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8）.

[7] 陈健夫，西藏问题[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第139-145页

的治理。而民国时期，西藏形成了与内地相对隔离的局面，具有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潜在危险。冷亮曾指出：“何谓西藏问题？分析言之，曰班禅回藏问题，曰康藏划界问题，曰中央在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而尤以后者为诸般问题之核心，换言之，前者为枝节问题，后者为基本问题，前者为局部事件，后者为整个办法。故中央在西藏统治权之恢复与否，乃判断西藏为我国领土与否之条件。”¹ 因此，如何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权已经成为时人思考“西藏问题”解决办法的核心。

具体而言，精英们所提的解决方案无非武力解决和平解决两种，或者二者综合运用。著有《西藏问题》的王勤培认为应该诉诸武力“镇服”，认为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即“合川滇甘三省之兵力，先镇服川边之藏番，此目前切要之图”。^[2]来自西康，任职于蒙藏委员会藏事处、曾担任《蒙藏周报》副主编的格桑泽仁在《康藏概况报告》一书中，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之办法：“纯用和平，则不足以戢达赖及其左右之野心，而使其觉悟就范，纯用武力逼迫，又恐其挺而走险，惟一办法，即先用武力以挫其锋，继之以和平而求德化，除中央通盘严密计划准备外，无论军事和议，均由有关系之川滇青各省合力会商应付。”^[3]他甚至在《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中还主张以西康省政府为解决藏案之“主体机关”，征集全康民兵，参加川军组织护法军，“命班禅进驻西康担任护法军总司令之名义，以资号召，则名正言顺，事无不成，政府只须饷械之援助”。^[4]举安也主张：“解决西藏问题治标方法是要有武装的准备，必要时用武力规复故土”。⁵

除武力解决办法之外，1929年，格桑泽仁还提出了和平办法：“为今之计，政府宜选一熟谙藏情且复与藏方稍有关系之人任为宣慰使，直接派至西藏。其路不宜由印度前往，因恐受英人掣肘而破坏进行，必须不辞辛劳，取道西康，沿途与康藏人民竭力宣传主义，到藏之后，与达赖及一班新派，详解地理历史上之关系，痛说利害，再细指帝国主义之罪恶，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何谓三民主义，何谓五权宪法，使之一一了解之后，伊必增一番觉悟，自不难接受宣慰之旨，过去之事概不追究。”⁶蒋致余也认为中央对于西藏“无非欲扶植弱小，团结种族，实行总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自决自治之遗训，成立整个中华民族，一致对外，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并无歧视达赖与全藏民众之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无一不可以至诚相见，在此中央已派员赴藏宣达中央德意，达赖又派有代表来京陈述西藏情况之后，西藏对于中央，已发生直接关系，关于西藏之一切纠纷，无一而不可以与达赖代表直接讨论。”⁷蒋致余对当时主张诉诸武力手段的观点予以了批评，认为：“听从一般无识者武力解决之主张，是直自掘坟墓，非至断送西藏不可，故余于未论解决藏事方法之先，敢大声疾呼曰，国人如欲谋西藏问题之解决，应先于和平中寻其途径，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可遽启兵戎也。”他指出：“武力征服，一时不易实现，即使无内忧外患之顾虑，实行征服政策，又谁敢保其不影响西陲边防乎，更谁敢保其不牵动国际交涉乎，且西藏处于万山重叠之中，形势险峻，交通阻隔，兼以地瘠民贫，知识未启，兵连祸结，疾苦已深，劳师袭远，胜负既未可前知，而百孔千疮，干戈尤不宜再动，”认为徒使压力于其身只会增加藏人之反感，而主张采取怀柔手段“以攻其心”，才是“应取之解决办法”。蒋致余进而指出：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自历史上，地理上，国家内政外交上，西藏宗教政治上，观察之，实事倍而功半，害多而利少”。⁸太虚同样认为武力解决“动非数万万允不可”，损失破坏“更不可计算”，“加

¹ 冷亮. 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J]. 边事研究, 1937, 6 (1)

^[2] 王勤培,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3] 格桑泽仁, 康藏概况报告[M]. 出版信息不详, 1932, 第45-46页.

^[4] 格桑泽仁, 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J]. 蒙藏委员会公报, 1929 (1/2).

⁵ 举安. 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 (8).

⁶ 格桑泽仁. 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J]. 蒙藏委员会公报, 1929 (1/2)

⁷ 蒋致余. 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M]. 南京: 大陆印书馆印行, 1932, 第68-69页.

⁸ 参见蒋致余,《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 南京大陆印书馆印行, 1932年, 第68页。蒋致余随黄慕松到西藏致祭和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后, 其对“西藏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而不再坚持和平解决“西藏

以艰难困阻，尤不知得何结果”，而主张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西藏僧界高僧协商解决。¹

在外交方面，对于与“西藏问题”形成有直接关系的英国，王勤培主张“坚持继续民国三年悬案之讨论，而置其他草约以及停战条约于不顾，此与英国开议中藏界址问题之方针”，通过与英国协商确定内地与西藏之边界，并主张“一方联合印度民族，积极从事于民族自决运动，一方又援助印度之自治与独立，以根本破坏英帝国主义在亚东侵略之大本营，此解决西藏问题之治本方策”。² 举安也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英国的交涉：“解决西藏问题要以英人为主要对象，过去中国政府应付西藏问题咸昧于问题的真际，多视为国内民族间的纠纷，或视为宗教上的争执，因此屡用所谓和平的敷衍政策，以至西藏问题陷于如此的严重。”主张“此后我仍以祖国的资格与英人交涉，对于全盘交涉绝对不能丝毫放松，于领土主权更不能丝毫迁就”。³ 王文萱认为，与西藏恢复“一向关系”之前，应向英国宣明态度，在“相当程度下维持英人之利益”，“俾减中藏关系恢复之阻力”，并坦言：“此非妥协，盖审度事实，谈藏事，不能舍英，若徒作听高远之论，与事何补哉？”⁴ 熟知西藏事务的蒋致余并不认同在解决西藏事务中与英国进行交涉的做法，他主张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今者英国已未干涉我中央与藏人直接解决西藏问题，殊不知国人何为而欲牵涉英国？”⁵ 冷亮也认为：“解决藏事应以西藏地方政府为交涉之对象”，“西藏事件为我国内政问题，而非外交问题”，并批评前清和北京政府在处理西藏事务上与英国协商的行为“属绝大谬误”，因而主张“今欲谋藏事之解决，吾人应始终保持直接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万不可再蹈以前北京政府之覆辙，而与英国交涉也。”⁶

精英们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建议中，强调国人应该从思想上高度认识到西藏具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关系整个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存亡与发展。“西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央政府对于和平还是武力手段的抉择，也有赖于中央政府妥善处理英国的外来干涉。

三、统治西藏之方策——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西藏治理书写

早在清末，对于如何加强对于西藏的统治和治理，知识阶层便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已经部分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显示出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中国人边疆治理观念的演变。1904年《拉萨条约》签订前后，清朝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知识阶层，对西藏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时人所言：“近年以来，举朝野上下，全国之视线，胥注于卫藏之一隅，人人攘臂而言藏事，或曰设行省也，或曰筑路也，或曰开矿也，或曰兴屯垦也，聆其言非不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实则一物无所见，而一步不可行”。⁷ 此言虽然在于批评时人在谈如何经营西藏事务上的纸上谈兵，但也透露出清末时人提出加强西藏治理的忧国忧民之心态。1910年，曾任西藏帮办大臣的温宗尧上奏清廷“维持西藏大局折”中指出，今日中国治藏“实大有可为之机”，“但须迅速、敏活，急起直追，而后可为，且需分别表里，善为操纵。在内之计划，则当兼程并进，不可无一日千里之心；在外之形迹，则当镇静、和平，不可无应付弥缝之术，不必遽改西藏之地为行省，而不可不以治行省之道治之；不必强西藏之俗同汉民，则不

问题”，转而赞成动用武力。参见喜饶尼玛、荣加林，《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65-67页。

¹ 太虚，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J]. 文化先锋, 1934,2(15).

² 王勤培.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第 107-108 页。

³ 举安. 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 (8) .

⁴ 王文萱, 筹藏刍言[J]. 开发西北, 1934,2(1).

⁵ 蒋致余. 三十年来藏事之回顾及其解决之途径[M]. 南京: 大陆印书馆印行, 1932. 第 70 页。

⁶ 冷亮. 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J]. 边事研究, 1937, 6 (1)

⁷ 佚名. 藏事危言[N]. 广益丛报, 1909-1-1 (192) .

可不以爱汉民之心爱之。”¹ 温宗尧主张对于西藏事务应该急起速图，不重形式而重实质上对于西藏实行行省郡县制度的管理，借以强化对西藏的治理。在清末诸多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治理的措施中，将西藏改建为行省，或以行省之道治理西藏成为时人主张的核心观点。他们主张保持当时的驻藏大臣体制，使其总揽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宜使之便宜行事，其威望权力与督抚等，政府不为遥制，匪第特加崇衔已也。前后藏事，均归管理……其达赖喇嘛，只准总理教务，一切行政，不得过问。”² 而清末西藏新政中，清政府已经这一思路纳入到西藏事务的管理模式中。然而将西藏改建为行省并未及得以实践，“西藏改建行省之议，前清腾诸舆论，见之奏章，卒未见诸施行”。³

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在政治上呈现出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局面，“西藏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精英们在考虑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如何能够有效地治理和统合西藏，也成为关注的重要问题。“西藏问题假若一天是解决的话，那么以后的西藏究应用什么方策去统治？这个问题我们尤须恳切注意。因为我们解决西藏问题的目标是在恢复统治权实行革新政策。”⁴ 无论确立各种政策，将西藏地区改建为行省是民国时期学者们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意见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将西藏建为行省的主张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华企云指出：“关于康藏建设行省之事，自来建议者，已不一其人。良以西康为川滇各省之屏蔽，而西藏则又中国本部之藩篱也。比来边疆各地，其为特别区域者，已逐渐改为行省。西藏于英，势尤岌岌”。⁵ 他引述格桑泽仁和宫敦扎西所提交的“康藏设省建议书”之“康藏分别改为三个行省之建议案”，认为西藏“实有即刻建省之必要。”⁶ 陈健夫则指出：“西藏建省尚非其时。”西藏建省自然是好事，“但事实上，现在是不可能的，目前所能做到的是一种预备工作，即是使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密切，无论政治与经济皆能趋于接近，预备工作成功以后，西藏建省是不成问题的，现在高谈建省，著者未敢苟同。”⁷ 陈健夫并非不认同即刻将西藏改建为行省，而是认为在当时时机尚未成熟，“西藏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建省不宜实践。在其所讲的预备工作中，整理西藏政务、实现政教分立也是建省的必备条件。⁸ 华企云同样认为，“西藏问题”解决之后，“宜将西藏改为行省”，“实为吾人当然之职分”。⁹ 徐位主张，中央在西藏设立驻藏长官，代表中央办理藏事务，同时指导藏人办理外交；认为在中央与西藏关系“初复之际”，“应付之宽严缓急，稍不得宜，即足债事，”建议遴选威望素著，洞悉世界大事的干员“方能胜任”。¹⁰ 在此过程中，要在西藏推行政教分离，政教应分立而治，达赖、班禅只管宗教，政治则由中央委任官吏治理¹¹。按照行省制度的模式改造西藏是精英们所认为的加强中央对藏治理的一致观点。

此外，在近代精英看来，西藏远处边陲，“隔绝内地”，原有可通的驿道已经“逐渐梗塞”，致使内地文化“无由灌入”，“中央政教威德无由昭示，启藏人藐视之心，无形中自成一国，要之不外因交通梗塞所致”。¹² 交通的“阻梗”对于解决“西藏问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西藏问题，数十年来，在外交上情形复杂，危机暗伏，在内政上和战皆非，应付乏术。推其原故，无非因交

¹ 佚名，卸任驻藏帮办大臣温咨请赵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折（宣统二年六月十二日）[J].外交报，1910（289）。

² 佚名，整顿西藏条约[N].广益丛报，1908-7-18（175）

³ 达生，经营西藏之借箸[J].说报，1914（10）。

⁴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⁵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155页。

⁶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160页。

⁷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169页。

⁸ 陈健夫，西藏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第195页。

⁹ 华企云，西藏问题[M].上海：大东书局，1930，第245页。

¹⁰ 徐位，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外交评论，1933,3(3).

¹¹ 王洁卿，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边事研究，1936，3（6）。

¹² 司徒澄，统治西藏问题[J].康藏前锋，1934,2(1).

通阻梗所致。”¹精英们还以印度至西藏的交通便利造成英国控制西藏政治经济为例，说明发展交通的必要性。“试观印藏间之交通，大吉岭以南，铁路已通。印边至江孜汽车道已修，所以今日西藏之政治经济，尽受制于英人之手。”“返观中藏间交通，犹是数千百年前之状况，相形见绌，能无憬然。”²中国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相对于英国经略印度、开拓印藏交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为这种差异造成了英国在西藏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解决藏事应把发展交通作为先决条件。王勤堉在著作中指出：“西藏问题之棘手，西藏人民之智识幼稚，实为一重要原因”，而提高其智识程度“当先谋西藏交通之便利”。³王洁卿提出的“根本方策”中也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方策”是首先是发展交通，改变内地与西藏交通不便的局面。⁴在此前后，黄慕松在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泽墨噶伦曾告诉他：“英国国势强大，通藏交通便利，一旦藏英有事，英军两周内兵力可抵拉萨，即使中央帮忙，增援部队，但交通阻滞，至快非三个月不能到拉萨。”⁵对此，黄慕松深有感触，其对从内地经康区前往西藏的道路情况有很深的体会。在对藏政策中，他主张：“由中央与西藏合组建设委员会，筹划开发交通事业。在短期内应注意完成拉萨玉树间、拉萨康定间、拉萨成都间与青海间之航空联络，其他汽车公路，循序渐进。”⁶由此看来，发展西藏交通成为巩固中央对西藏治理具有根本性价值的事务。

精英们还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化解汉藏隔阂，融洽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认为有必要在西藏推行边疆教育，普及国文国语，灌输同属一国的国家观念和意识，从而实现“化特殊为相同”的目的，而达到塑造国民，构筑统一国家政治认同的终极目标。举安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要发展西藏教育，灌输西藏民族的国家思想和民族观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文化、思想观念的趋同，进而寻求汉藏民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⁷。王洁卿认为“西藏问题”之治本方法“尤在励行普及教育，灌输内地文化，先求语言文字之统一。然后消灭种族成见，以产同一之国家观念”，“西藏问题不消灭而自消灭矣”。⁸“盖惟言语文字相同，然后对国家方能产生同一之观念，同一之信仰；我汉藏间之风俗习惯既异，言语文字，又复不同，故其产生同一之国家观念，团结一致，以御外侮，不亦难乎？”⁹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出发，精英们认为追求语言文字风俗等的“同一”是加强国家统一的重要途径。同时，精英们还主张应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文化沟通。黄慕松自拉萨返回后所提的建议中，主张“在拉萨筹办一种汉藏合印定期刊物，以沟通感情，传递消息，介绍内地文化与中央施政方针”¹⁰，从而拉近西藏与内地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李有义也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谋求对西藏的长久治理，应着重于“文化之沟通”，武力手段仅是必要时可用作“前奏曲”，“百年大计则仍须赖文化之沟通，满清之错误即在未作文化之努力”，“只有文化之沟通方能加强国族之团结，此当为吾人建设边疆之中心工作”。¹¹

以上总结了精英们对西藏加强政治整合，实行有效统治的基本路径，除上述之外，他们还主张要发展内地与西藏之经济贸易，尊崇西藏佛教等。精英们的对策建议中渗透着浓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对于人们思考边疆治理，建构整个国家的主权意识和疆域理念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¹ 徐位. 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 外交评论, 193,3(3).

² 徐位. 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 外交评论, 193,3(3).

³ 王勤堉.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第117页.

⁴ 王洁卿. 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 边事研究, 1936, 3(6).

⁵ 佚名. 英人侵略西藏[J]. 新民丛报, 1903(31), 第112页.

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第113页.

⁷ 举安. 英人侵略西藏之探讨[J]. 康藏前锋, 1934(8).

⁸ 王洁卿. 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策[J]. 边事研究, 1936, 3(6).

⁹ 王勤堉. 西藏问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第107-108页.

¹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第113页.

¹¹ 李有义. 西藏问题之分析[J]. 边政公论, 1948, 7(3).

小结

精英群体有关“西藏问题”的认知和书写，揭示出近代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国人传统观念向近代理念的转变轨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从传统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本身包含着近代中国人一种世界意识的产生。这种意识的产生或出于被动回应或得益于对近代西方思想的解读，不管怎样，从边疆经营层面来说，它唤起了此期社会舆论和民众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亦为此期边疆问题的合理解读提供了另一种阐述话语”。^[1]有关“西藏问题”的文本书写同样遵循和体现了这一逻辑。

近代以来，精英群体有关“西藏问题”的相关著述为内地社会了解和认知西藏，总结西藏治理中的经验和教训，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视角广泛、内容丰富的参照资料。这些文本书写“凡所引证，悉凭典籍。推原索委，聊抒所见”，希望达到使时人“俾知藏事关系边防，既如此重要，而纠纷情形，又异常复杂，苟能知往鉴来，惩前毖后，不视为一隅之利害，而以全国之力，切实经营，则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的基本目标，彰显出近代精英群体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本书写的经世致用之基本脉络，通过自己的文本书写，为中央政府的西藏治理提供借鉴，希望“政府当局放远目光，亟起而图之”。^[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书写均有意无意地遵循着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展开，这是近代精英群体对西藏等边疆进行文本书写的基本情境，而且相关文本为近代中央政府的西藏治理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资鉴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我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的“西藏问题”，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知识精英关注备至的所谓“西藏问题”在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后已经全部解决。而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西藏问题”已经从包含历史、政治和法律内容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扩展到涵盖西藏人权、宗教和文化的诸多议题，演变成西方反华势力牵制中国发展和分化中国的重要主题。^[3]现在的所谓“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而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的问题”。^[4]这是当代中国知识阶层需要面对和积极探索破解之道的时代使命。

^[1] 邹明洪、冯建勇，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10).

^[2] 徐位. 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J]. 外交评论, 1933 (3).

^[3] 李学保、金飞雪，“西藏问题”国际化及应对策略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 (2).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政府西藏白皮书汇编[G]. 人民出版社，2010，第 37 页。

【论 文】

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¹

王海兵²

摘要：本文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康建省运动置于各种势力的角逐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康区民众的省制观、国民党中央指导下的康区精英省制运动、刘文辉的省制策略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些不同层面的力量在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博弈。

关键词：西康建省；康区民众；国民政府；格桑泽仁；刘文辉

西康建省是近代中国行政建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曾深刻影响过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格局。近几年，随着康藏研究的逐渐升温，西康建省再度为人们所关注。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看，往往是侧重于探讨西康建省的意义，而对建省的过程尤其省制化过程的分析失之简单。本文试图将1927-1939年间的西康建省运动置于各种势力的角逐中进行考察，揭示不同层面的力量在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利益诉求与权力博弈。

一、康区民众对建省的态度

西康建省之议起于清末国步益艰、藏事日亟的情势之下，并随着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强力经营而臻于成熟。宣统三年（1911）三月，在相继完成对康区大部分地区改土归流的基础上，赵尔丰以回应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广总督岑春煊统筹西北全局的形式，明确以川边建省为主题上奏朝廷。³紧接着，赵尔丰的继任者傅嵩林再次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向清廷详细阐述了川边建省的理由，并奏请设立“西康省”。⁴但是，当该奏折上递时，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川省秩序已经大乱，文报不通，不久清朝即宣告垮台，于是傅嵩林的西康建省折也空为后人留下一纸蓝图。

进入民国以后，康区历经尹昌衡、张煦、刘锐恒、殷承、陈遐龄及刘成勋几位统治，一贯兵威，既不足以震慑，政绩又多亏败不堪，均以争夺攘据康东打箭炉为能事，坐收税金，以求发展势力于川南，致使川边政府在康区大失民心。而自1918年康、藏冲突后，康区二十余县被藏军占领，在西康的藏军控制区内，残酷的剥削使得康民苦不堪言。而且由于康藏划界仍成悬案，康区局势时常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西康建省之议遂湮灭无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西康省制化议题再次被国人提起。1928年9月，考虑到蒙藏地区幅员辽阔，袤延万里，蒙藏边防的虚实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因此为了安定蒙藏地区及其周边的政治形势，国民政府明令将兼管蒙藏之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宁夏各区，改建省制。而就西康的实际情形来看，当时的西康（仅限于国民政府政令所及的康东十三县地区）地方“既无得力的政治负责之机关，又无得力防守之军队”，至于被藏兵占领之地，则苛虐蹂躏，而未失之十余县则匪盗横行、哀鸿遍野，致使康人“既不能与川民受同等之待遇，复不能与藏民享共同之利益”。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无论是旅外西康人士还是身处康区的广大康民都表现出了对康

¹ 原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² 作者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³ 参见《议复岑春煊等统筹西北全局奏请川边建省折》，宣统三年三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0-921页。

⁴ 参见《傅嵩林请建西康行省折》，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六日，《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1032-1035页。

⁵ 《西康国民协进会及旅京民众等请防止英帝国主义嗾使藏军进攻西康要求成立西康省政府等呈文》，1929

区状况的不满与担忧。于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通过建省来保护本地区的利益渐成康区民众的呼声。

1929年8月17日，西康旅京人士刘家驹、格松尼马等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说：“西康警报频来，危亡已在眉睫，恳请迅派负责人员组织西康省府，以图挽救。”言之所及，掬诚泣恳，闻之令人动容。当时处于极度混乱环境下的康区民众由于饱尝战乱的痛楚，在省籍意识上，除了要求直隶中央外，也明显体现出了对西康政治的参与感。在1929年西康国民协进会的呈文中，虽然认为解决康事之“先决问题”为组织西康省政府，但是在西康防卫问题上主张将西康军队“彻底改编，另组为西康省防军，完全脱离川局影响，俾得专门从事康务”；认为防守康区的军队“若仍归于川中将领之指挥，则遥遥节制，呼应不灵，终陷过去因循敷衍之覆辙”；对于西康省政府的人员组成，则要求“于西康省政府人选中，参加过半数康人，俾于扶植弱小民族之意中寓康人自理政权之真义”。¹而作为康区精英，格桑泽仁也曾于1929年3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西康建省的人员安排计划，他认为“省政府委员至少亦须七人，其中西康应占四人，按康之东南西北四部各选一人，在此过渡期间，无论僧俗，需择其素有声誉、为人民信仰者，如此，则康之部落易于团结”。²这也同样体现了康民在西康建省问题上的自治理念。

1930年，因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的土地差民争端的持续升级而形成了康、藏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促使国人尤其是康区民众更加担忧英帝国主义的威胁，西康建省的呼声在康区防务危急的关头也因此进一步高涨。至1931年，纠纷渐成迁延不决之势，前线真相众说纷纭，康区防务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康民于同年2月11日组织了民团组织——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并提出了“家出一兵，誓与藏逆决一死战”³的豪言壮语。同时，西康旅京人士杨仲华、马泽昭等纷纷吁请中央从速组织西康省政府，以专责成。⁴西康旅京同乡请愿团更是分呈国民政府与刘文辉，明确提议以班禅为西康省主席。⁵而诺那驻成都代表熊禹治也于1931年4月在其《解决康藏问题建议书》中主张将西康分建康定、昌都两省，建议任命诺那为昌都省主席。其中，康定省西界为金沙江，昌都省西界为丹达山。熊禹治的这一主张被任乃强先生认为是“规划西康建省诸说之最有价值者”。⁶总的来说，上述要求西康建省的呼声反映了康民保家卫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同时也明显体现了康民参与康区管理的意识觉醒。但是在当时西康的客观条件下，必先将军事妥为筹定，然后庶政乃有次第设计之可能。

二、1932年格桑泽仁的建省实践

对于西康民众强烈要求建省的呼声，国民政府相当重视。1929年2月26日，国民政府决定派吴醒汉、魏崇元等为视察西康专员，赴康调查军政、教育、实业等，并会同四川省政府筹备西康建省事宜。⁷但是，时过半年尚未就道，致使康民因以失望。⁸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第

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档案全宗（1）2618。

¹ 同前。

² 宁墨公：《西康防务论》，《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

³ 《西康特区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为请发兵或枪弹援救康民事致刘文辉电》，1931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⁴ 参见《西康旅京民众杨仲华等请中央速电达赖制止藏军侵康并拟四项处理办法致蒙藏委员会呈》，1931年3月23日，《康藏纠纷档案选编》，第92页；《中央执委会秘书处奉转西康民众代表吁恳制止达赖侵犯西康请愿书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1931年4月8日），附《抄西康民众驻京代表请愿书》，《康藏纠纷档案选编》，第105页。

⁵ 参见周儒海：《西康建省运动的检讨和展望》，《边事研究》1936年3卷3期。

⁶ 任乃强：《西康图经·境域篇》，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页。

⁷ 参见《国民政府训令四川省政府派吴醒汉等筹备西康建省文》，1929年2月26日，张羽新、张双志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4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197次会议决议咨请国民政府，迅行规划组织西康省政府。¹ 然而从当时国民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实际影响力来看，西康建省的条件显然还没有成熟。以西康国民党党务为例，1926年，正当国民革命在全国兴起之时，三民主义的空气也开始弥漫到了僻处一隅的西康地区，其后虽经当时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禹九）的积极倡导与扶植，国民党党义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自从1928年刘文辉的24军接管西康后，西康国民党党务却相继被停办。² 党务的发展从侧面上反映出当时国民党中央在康区的权力是相当薄弱的。这一情况决定了国民政府还不大可能对整个康藏问题做出具体有效的计划，加上当时川局未定，因此对康民西康省治的呼声，国民政府的回应只能示以理论上的指导，暂时未能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

然而1930年康藏交界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很快使这一困局发生了转机。1931年4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8次常务会议决定派西康籍的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随后蒋介石亦以康藏国防关系重要，为疏通康藏隔膜起见，又加委格桑泽仁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之职，并发给无线电收发报机一架，以方便联系。³ 很显然，国民政府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增进对西康的控制，为西康建省做准备。1931年7月，就在康案特派员唐柯三尚在康区调解康藏纠纷之时，格桑泽仁担负着国民党中央的旨意从南京出发，前往西康。⁴

1932年2月初，当格桑泽仁到达巴塘后，先于巴塘成立办公处，并印发了各种藏文宣传品，积极派员赴康南各处宣传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将国民党中央优待康藏民众的事实列举详告，并将康民中的优秀分子组织成立党义研究会。其他的人民团体，如喇嘛佛教联合会、妇女协会、商会等均次第成立。⁵ 格桑泽仁的党务活动对驻康24军的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抵制国民党势力，刘文辉令康区各地驻军监视党部行动，并检查邮政，继而由24军主办的康藏通讯社登载侮辱党部的消息，甚至对党部人员实施抓捕。驻康川军的行动激起了康南民众的愤慨，继而康南各地的24军驻军概被缴械。1932年3月，康南各县代表148人齐集巴塘，决定组成“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以纳噶活佛为主事，并将西康当局贻误国防、压迫康民以及残杀国民党党员等经过呈报国民党中央及通电全国，并声明不再服从24军当局。同时，请中央根据1928年发表的西康建省令，速派大员来康组建省政府；由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推选委员15人，组成“西康建省委员会”，以促成建省；组织“西康省防军司令部”，将各县原有民兵统一组织训练，当时编制之僧军与民军总数达 7800 多人。⁶

康南事态的发展可以说出乎国民党中央的预料，因此当格桑泽仁于事件发生后请求国民党中央派员主持康事时，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于1932年3月28日、5月13日电复格桑泽仁，令其取消委员长、司令名义，回京报告。⁷ 很显然，中央不愿看到因康南事件而造成与刘文辉的公开对抗，因为当时的格桑泽仁除了在名义上拥有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头衔外，在实际的军事资源上并不占优势，更何况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实际控制康区。因此，国民政府直接接管康区的时机显然尚未成熟，而且也不愿看到因为康南事件而使康藏纠纷扩大。

⁸ 参见宁墨公：《西康防务论》，《军事杂志》1929年第18期；《西康国民协进会及旅京民众等请防止英帝国主义噶(唆)使藏军进攻西康要求成立西康省政府等呈文》，1929年6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档案全宗（1）2618。

¹ 参见《中央政治会第一百九十七次会议》，《蒙藏周报》1929年1卷3号。

² 参见黄奋生：《蒙藏新志》，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5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³ 参见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1932年铅印本，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目录（综合类）全宗1-38/5，第13页。

⁴ 《如何应付康藏问题·党务人员出发》，《蒙藏周报》1931年第75期。

⁵ 参见佚名：《格桑泽仁代表入京之报告》，《四川月报》1932年1卷4期，第110页。

⁶ 参见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第18-21页。

⁷ 参见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第23页；《三月二十八日蒙藏委员会电》、《五月十三日中央执委会电》，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6-457页。

而对刘文辉来说，早在格桑泽仁在巴安起事前，刘文辉就以唐柯三与藏方所签条约于四川损失太大、不能接受为由，于1932年2月从国民政府手上取得了康藏纠纷事件的处理权，因此格桑泽仁在巴塘的活动无疑是在危急时刻挖刘文辉的墙脚，这对当时在康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刘文辉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尽管后来由于藏军对康南的进攻使得格桑泽仁基于国防上的考虑而搁置了与刘文辉的个人恩怨，双方暂时取得了一致，但是格桑泽仁的存在始终对刘文辉在康区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因此，当康南战事告一段落后，刘部迅即重新接管了康南，而格桑泽仁也即于1932年9月离开巴塘。随着格桑泽仁的撤离，由国民党中央所“导演”的康区精英省制运动也暂告一段落。

三、刘文辉的省制策略

1927年夏，刘文辉吞并刘成勋的部队进驻康区。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为四川省省长，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在刘文辉接手康区之初，康区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纵观这段时期刘文辉对康区的施政，虽然在西康设立有“西康政务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隶属于刘文辉的24军军部边务处。在这段时期里，刘氏经营西康，“其目的并非在整顿边政，其最大目标，实欲藉经营边政之虚名，以售其扩张地盘增加收入充实军备之计，且西康幅员广大，而刘氏所汲汲经营者，事实上仅于川地之雅安宁远一带而已，平时除抽粮纳税以外，并不闻有何等殖边计划，见诸实行”。¹ 套用刘文辉自己的话来说，由于主持川政，故对康区“精神不克专注，一切建树未能俱如所期”。² 但是，此后形势的发展促使刘文辉必须在西康建省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

首先，自1932年以来，在川康军与青海军队的联合反击下，金沙江东岸四县被川康军收回，部分解决了西康省境的问题。而西藏方面也在这次战争中意识到了康、青军队不可轻视，加上西藏内部反战情绪的高涨，此后不敢大规模进行康藏战争，为西康建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更主要的是，1932年冬就在川康军把藏军驱赶至金沙江以西之时，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军反对刘文辉的四川内战发生。从1932年冬到1933年秋，在经过三个大的战役后，刘文辉被赶到了汉源场。最终还是看在“家族情谊”的面上，刘湘把雅安、荣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才由此在康雅一带立足。³ 刘的失败加速了西康建省的进程。

当时对已经退据边陲一隅的刘文辉来说，通过建省来确定地盘的“合法性”便显得十分迫切。而对国民政府来说，由于1932年9月的西防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和康、青、藏边界的防务问题，同时青、康军阀无视中央意见而擅签的康、青、藏边界条约也显示出了南京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尴尬境地。而且当时急于控制四川的蒋介石也不愿看到刘湘的势力坐大，因而也同意让刘文辉据持西康，以作为牵制刘湘的工具。⁴ 加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亡的意识空前高涨，当时国民政府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做了长远的考虑后认为，西南的川康地区是进行持久抗战的理想根据地，包括西康建省在内的川康地位问题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于是各方政治利益的演变结果是，1934年2月，南京政府颁发了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并于1935年7月在雅安正式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西康建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康政治从24军的军管时代进入了省政时代。

其次，国民党中央试图加强对康区的控制迫使刘文辉采取正确的措施以稳定其在康区的地位。格桑泽仁事件后，稍有起色的西康党务在刘文辉的压迫下再次停办，其后，西康旅京同乡会

¹ 王克训：《西康问题的检讨与今后之对策》，《蒙藏政治训练班季刊》1934年6月，第41页。

² 刘文辉：《完成西康建省之意义及今后施政之中心骨干》，《康导月刊》1939年1卷5期，第12页。

³ 参见陈光藻遗稿：《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大混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⁴ 参见张为炯：《西康建省及刘文辉的统治》，《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内部发行），1965年，第28-29页。

曾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西康党务有所建议，但是考虑到种种情况，执委会对西康旅京同乡会的请求做了缓办的批复。¹ 即便如此，国民政府试图通过西康建省而在西藏问题的解决上有更大作为的努力却一直都未放弃，更没有放弃在康区排挤刘文辉以达到直接控制西康的目的。这一点在1935年的诺那事件以及1939年的班禅行辕事件中有明确体现。关于这两起事件，刘文辉在1939年12月25日的一份报告中认为：（1）发起者都是中央所组织的机关；（2）都是假借中央名义以煽动康民；（3）都是宣称只反对地方政府及驻军而表示服从中央。因此，在上述事件的定性上，中央不认其为变乱，社会亦忽视其为变乱，这使得刘文辉在康区的境况显得十分尴尬。对此，刘文辉曾含沙射影地表达了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² 同时，对于上述事件中频频出现的“康人治康”的口号，刘文辉认为“为了建设的成功，人才不应该限以省籍”，“以‘康人治康’相号召，其阴谋在割据造乱，苟得结果，也无非在摧毁西康，这完全与建设新西康的光明大道背道而驰”，³ 明确表达了对这种做法的批评。解放后，已经回到人民阵营中间的刘文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更是直白地认为这些事件“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利用和制造汉藏民族矛盾，来打击我，限制我，削弱我，使我无法立足，以达到其控制西康的企图”。⁴

由于自身所面临的窘迫境况以及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康区的明争暗斗，为了能在形势复杂的康区站稳脚跟，刘文辉针对康区特殊的社会状况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宗教上，进入民国以来，在康区复杂的民族政治形势和汉藏间关系紧张、冲突频繁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搞好了康区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因此，从尹昌衡到刘成勋的历届川边政府对于康区宗教均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恢复和保护川边寺庙就成了当时川边政府对藏政策的重要一环。同时，为了指导边、藏僧俗修明佛教，以谋五族共和，加强对喇嘛寺的监管和对佛教教规的整顿也成了川边政府的应行之事。鉴于此，1933年退守川边一隅的刘文辉在继承上述政策的前提下明确地提出了“以政翼教，以教辅政”的方针。⁵ 由于喇嘛人数在康区总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许多优秀人才都集中在寺庙，凡康民之精神物质生活，均在宗教范畴之内，故康地寺庙的盛衰消长，与地方政治及人心趋向均息息相关，康区社会的寺庙组织绝非任何主观力量所能摧毁。因此，刘文辉对康区佛教“既不恃武力，亦不假权术，惟知开诚布公，因势利导，力谋政教之协调合作，以纳民于轨范”。在此认识的基础上，1938年5月14日，刘文辉于释迦成道日在康定成立五明学院，通过五明学院来整理、规范康区佛教，同时，召集僧伽代表会议，宣布治康政见，以减少施政障碍，并间接地由研究学术之机关沟通汉藏文化，协调康地政教，以收团结人心、巩固边防之效。⁶ 上述这些措施正是刘文辉所提出的“以教辅政，以政翼教”方针的具体实践。

同时，刘文辉也十分注重通过自己的活动加强对康藏佛教人士的笼络。他在自己住宅布置一座经堂，迎请阿旺堪布、格聪活佛、日枯古学等有名望的喇嘛为他讲经修法。自己也随时拿着手摇转经筒，口念六字真言不绝。⁷ 他还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以经济上的照顾。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西藏的一些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層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三大寺供养，并派人到拉萨学佛，借以加强政治联系。

¹ 参见黄奋生：《蒙藏新志》，《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5册，第245页。

² 参见贺觉非著、林超校：《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³ 刘文辉：《第二讲建设新西康的理论体系》，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85页。

⁴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⁵ 参见离谦：《康定县藏传佛教概况及其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24页。

⁶ 参见刘文辉：《对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的希望及本人治康简单经过》，《康导月刊》1940年2卷12期，第4页。

⁷ 参见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¹ 就这样，曾被刘湘等军阀联手打得一败涂地，只剩下川边关外十几县、政治生命垂危的刘文辉，“玩出一套‘弘扬佛法’的花招，便能稳住阵脚，慢慢又爬起来”，最终也使得“蒋介石无法把他吞下”。²

除了以尊重宗教为核心外，刘文辉从中国几千年来经边政策的得失中，结合他十余年来治边的经验，把“建省”、“经边”、“对藏”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分别确立了“四力”、“三化”以及“三进”政策。刘文辉认为，“在经边的意义上，也可说，西康建省的动机，完全是针对西藏问题，至少应将西藏问题包括在内”。³并在深刻体会到对藏问题的困难症结后，刘文辉对康区的吏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也做了详细布置。在吏治方面，彻底澄清吏治，加强民族联系，努力将西康政治影响扩大到金沙江西岸，使藏人产生向心力；经济上，把边茶作为经边、对藏的政治工具，牢牢控制边茶的经营贸易；军事上，在金沙江东岸，配备相当武力，采取震慑的态度，以防止藏军东进。⁴

总而言之，刘文辉在西康所采取的上述这一系列政、教措施在客观上大大缓和了西康汉藏民族间的矛盾，改善了康藏关系，对西藏方面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康、藏双方在康区政治争斗的结果是，“康人无不乐受汉官管理，而西藏以此失其引诱煽惑之魔力”。⁵由此刘文辉也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并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此外，客观时势的发展变化也给刘文辉在康区地位的稳定带来了契机。

首先，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迫使国民政府暂时放弃了对班禅回藏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通过西康建省来实现解决西藏问题的迫切性。同时，由于抗战形势日趋紧张，在国民政府西移后，西康在经济资源、汉藏桥梁等方面凸现出了它的价值，川康地区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出于加强西南地区国防安全的考虑，西康建省实难再缓。其次，就当时的康藏关系来讲，自1938年春天起，西康、青海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一连串和谈会议的召开，有效地巩固了康青藏边区局势，为西康省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了西康建省委员会，并指定刘文辉为委员长。4月，刘文辉赴汉口会见蒋介石，力陈西康建省的必要，蒋除了表示答应将宁、雅两属划出四川以实西康外，还应允在西康建省后，按省预算由国民政府与四川省政府补助西康不足的行政和建设经费。⁶11月20日，行政院在武汉召开国务会议，经讨论后决定西康建省，并于11月28日致电刘文辉，定于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立西康省。

随着西康省的建立，从清朝瓦解以来一直处于失序状态的康区被重新纳入一个新的统治秩序之中，在制度上有效地保障了康藏边界地区的稳定，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对于加强康、藏之间的民族感情、经济交往以及康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对于刘文辉来说，西康省制的确立也最终为他在民族、宗教相当复杂的康区赢得了“合法”的地位与生存空间。

四、结语

通过对1927-1939年西康省制化过程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从西康民众对建省的态度来看，康民要求西康建省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社会动荡、安全缺乏的环境下为了免遭外界军事、政治等势力的蹂躏和迫害，并要求保护地方利益的

¹ 参见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5-26页。

² 任乃强：《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6页。

³ 刘文辉：《建设新西康之理论与实际》，《康导月刊》1944年5卷10期。

⁴ 同上。

⁵ 刘文辉：《第六讲：建设新西康的六项任务》，《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第777页。

⁶ 马宣伟：《刘文辉与西康建省》，《文史杂志》2002年第5期；刘文辉：《第一讲：建设新西康的基本认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第520-521页。

省籍意识的觉醒。这种省籍意识是针对西康军政当局及西藏地方政府贻害康区而表现出来的脱离二者、要求自治的心声。此外，西康民众还积极要求国民政府直接指导西康建省，这反映了康民对改良康区政治的一种期待，同时也为国民政府加强对康区的控制带来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在康藏地区的实力相当有限，西康民众在省制问题上的希求并没有结果。

其二，在1932年进行的建省实践中，拥有双重身份的格桑泽仁为了建立一种在西康地方精英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社会，并将其理念付诸实施，以清除外来军阀在康区的统治权威。在此过程中，康区精英的身份使他必须尽量地为康民赢取更大的自治空间。然而，作为中央政府在康区的代言人，格桑泽仁的省制实践又不能游离于国民政府的康藏边政框架之外。从学理上看，国民政府倡导康人自治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地方对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效忠与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国民政府基于和刘文辉在康区势力的权衡以及对西南边疆局势整体的考量，并没有对康区精英所发动的以“康人治康”为核心的西康省制实践给予足够的支持。

其三，国民政府试图直接介入康区事务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与时西康军阀刘文辉发生了控制权上的争夺。在实际主康的刘文辉看来，国民政府发动康区精英实行自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除由地方军阀主宰西康的局面。这种情况迫使刘文辉采取正确的治康措施来改善康区的政治环境以收拾人心，从而有效地抵制了国民政府所支持的一系列反刘事件，也在客观上改善了康藏关系并最终牢牢地在康区站稳了脚跟。同时也应该看到，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刘文辉之间的这种权力纠缠只是一种统一国家建构层面下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反映，这种权力之争会随着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时势变迁而转变。总之，西康省制化进程既是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阀力量权衡下的一种讨价还价，也是双方在战略上的共赢。

在国民政府与刘文辉就西康建省达成一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泯了康区本土民众对其理想中省制权利的争取。这一点在1945年7月格桑泽仁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时所提交的《请确立蒙藏自治区制度载诸宪法草案》的提案中有充分体现。在该提案中，格桑泽仁指出了整齐划一的省县制度严重脱离了康区的实际政治情况，并建议取消形式上的省县制度来提高康民的自治程度，进而达到改良康藏政治以加强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目的。¹ 格桑泽仁的上述主张充分反映了西康的省县制度与康区民众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制度存在着一定差距，然而这一提法在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和康区的实际情况下，无疑又过于理想主义。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99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参见格桑泽仁：《边人刍言》，1946年铅印本，四川省档案馆藏：历史资料目录（司法行政类）全宗5-102/4，第60-63页。